

# 历史大场景下的疫情传播:问题与方法

——2020 中国传播创新论坛·云端对话会议综述

肖 珺 肖劲草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将人类社会置于巨大的社会危机中,“历史大场景下的疫情传播:问题与方法”云端对话提出三种认知路径:生命进化史、文明发展史和人类交往史,学者们提出八个议题的思考:①晚清的鼠疫与《申报》叙事;②疫情中的媒介依赖与多元化主体传播;③人作为媒介:流动与区隔——网络社会背景下的疫情传播;④新冠肺炎疫情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确立与传播;⑤病毒的传播学;⑥不确定时代的“新生活政治”——文化研究的风险转向;⑦政治沟通视野下的政务微博传播;⑧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伪健康信息以及纠正的思考。疫情蔓延之处,皆有传播之困,正在发生的人类灾难也在推动“我与你”“我就是你”的主体间性公共空间的形成。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传播;历史大场景;问题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0)04-0059-05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XWB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413100021)

4月11日,2020中国传播创新论坛·云端对话第一场“历史大场景下的疫情传播:问题与方法”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高校的研究者在虚拟会议室“共聚一堂”,学者们从新闻史、群体传播、移动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病毒传播学、文化研究、政治沟通、健康传播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交流。据悉,这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首次举办的聚焦疫情传播的研讨活动。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

讨论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近300位听众参与。很多参会者认为,武汉在4月8日“解封”后举办这次云端对话为学者们提供了一种学术释放的空间,可能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本文根据云端对话录音整理而成,其目的一是将学者们的在线发言和讨论保存为历史文本,二是希冀学者们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进行的反思和学理讨论为后续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理论参照。

## 一、缘起:在历史的大场景下理解疫情传播

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人类社会整体性地置于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迄今,全球累计确诊逾354万例,累计死亡超25万例(至本文发稿的6月20日,这两个数字已分别增至844万、45万例),世界在恐惧和不安中挣扎,经济发展和全球化面临衰退。此外,病毒的传播和扩散改变了我们的交往方式、交往结构,凸显了我们对媒介、网络和关系的依赖,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媒介、思考交往、思考文化和思考传播学本身提供了问题与参照。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深入阐释了本次会议的主题,即“历史大场景下的疫情传播:问题与方法”。他指出,COVID-19悄然寄生人类宿主,陌生的新冠病毒再次打破人与病毒共处的脆弱平衡。新冠肺

肺炎疫情正在改变历史,它迫使我们追问,人类应该在何种历史场景中讨论疫情传播?单波进而提出三种认知路径:生命进化史、文明发展史和人类交往史。他认为,此次疫情使我们重新面对人与病毒的关系史,把我们带入生命进化史的场景中,在人与病毒共同进化的历史过程中理解“人与万物共生”的意义;同时,病毒的媒介化是文明发展的产物,在文明发展史的场景中,病毒深深介入文明间的交流过程,制造了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病毒与生命体相互作用的历史告诉人们,与其把自己看作是离散的、本质上是人类的人,还不如把自己理解为通过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而成为的人。因此,在人类交往史的场景中,人类应该把自己纳入自然、生物、物的关系中考量,保持主体间性的思考维度,把自己还原为栖居于“病毒星球”的人,从而真正理解“万物皆媒”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关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下的疫情传播?中国新闻传播的研究者、实践者站在历史的大场景中,做了什么?还应该做些什么?参加云端对话的八位演讲者分享了他们的思考。

## 二、疫情传播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基于八个议题的思考

### (一)晚清的鼠疫与《申报》叙事

为了客观地评判中国大众媒体在本次疫情中的表现,理解其功能和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润泽教授以史为镜,分析了《申报》对晚清鼠疫的报道,探寻其对公共卫生事件的介入方式和叙事框架。研究发现,《申报》在1910—1911年就鼠疫发表了600篇报道。其中绝大多数为上海鼠疫,而非更为知名、破坏力更大的哈尔滨鼠疫。报道围绕事实报道、知识普及、制度建设和观念更新等层面展开,其中知识传播方面的报道内容占比最高。在事实核查方面,《申报》虽以见闻登报,但若发现不实,则立刻更正辟谣,重视真实性。通过话语分析,研究发现《申报》的鼠疫报道有“解构中医,建构西医”“反对迷信,推崇科学”“外争主权,内促建制”的叙事框架,在普及公共卫生知识、防疫方法和医学知识等方面笔墨较多,在批评租界管理当局的越界管理行为,号召建立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启蒙更新民众观念等方面影响舆论,参与公共事件。可见,大众媒体的介入对当时社会的整体认知形成了重要影响,并与公共卫生近代化产生紧密关联。王润泽认为,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切入医疗社会史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公共卫生现代转型的理解。

### (二)疫情中的媒介依赖与多元化主体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的隋岩教授从群体传播的学术视角深入解析疫情传播。他提出用“具体文本”“文本集合体”“事件相关体”这三个概念来分析传播主体多元化的影响。在传播主体多元的情况下,人们对公共事件的叙事也变得多元,形成海量的“具体文本”,各种“具体文本”之间又有大量的互动和关联,产生了“文本间性”。“具体文本”的集合可被视为“文本集合体”,它们会影响事件本身的进程和演变,因此事件又可被称为“事件相关体”。一件过去的事件,可能被新生的“文本集合体”重新“召唤”出来,进一步延伸和发展。“文本集合体”与社会事件的结合日益紧密,逐渐成为建构社会事件的重要因素,对情绪、态度和行动的影响日益加深。隋岩强调,疫情加深了媒介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形成了深度的媒介依赖。在疫情中,人们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媒体来获取信息、表达情绪与观点,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传播在使传播主体多元化、主体叙事多元化的同时,又使人陷入“信息的海洋”与不确定的信息环境,反而使传播主体面临着无效传播的困境。隋岩认为,如何面对深度媒介化社会的传播主体多元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命题,这可能挑战交往主体的自主性。

### (三)人作为媒介:流动与区隔——网络社会背景下的疫情传播

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流动性”理论为视角,从“游牧主义”和“定居主义”这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出发,引申出“流动”与“区隔”这两个概念,讨论了网络社会背景下疫情传播中“流动与区隔”既冲突又依存的复杂状况。孙玮指出,作为病毒的媒介,人的流动会加剧病毒的扩散,因此对于流动的管控,即制造区隔和边界,是抑制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日常生活又不断召唤着流动,当今网络社会的逻辑与现实,致使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群体、区域可以完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流动,构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时代的优先性。人则是形形色色动态网络中最初和最终的媒介。在病毒传播、物理隔离、观念分享、舆论节奏、封城与解禁等疫情期间的社会现象中,都

体现着“流动”与“区隔”的冲突与并存。各类主体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调整自身“流动”与“区隔”的优先性和配置方式。这种配置方式及其社会影响,可以通过配置的主体、有形与无形、时间与空间等维度加以呈现并阐发。孙玮进而提出一些深入的思考,如“流动”是否必然带来连接、认同和共享?互联网时代的“流动”具有何种优先性?介入公共事件的媒介主体的变化将带来怎样的社会变迁?文化传统如何影响甚至决定关于“流动”与“区隔”的社会决策?“流动—区隔”复杂多变的配置方式及其蕴含的传播理念,将引发一系列重大社会实践的后续展开。在疫情全球传播的状况下,重新思考它们的含义与价值,或可提供一个契机:新闻传播学研究及实践创造新型的人类生存方式。

#### (四)新冠肺炎疫情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确立与传播

疫情的全球大爆发影响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冲击着全球化和现有国际秩序。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讨论了疫情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确立与传播,她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直面全球化困境的现实针对性,对破除意识形态偏见、求同存异和共同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支撑,中国积极与国际分享信息、联手抗疫都体现了这一理念。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的任务,我们应搁置各类中心主义的合作框架,搁置各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克服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孤立主义,挽救生命,协作抗疫。在这种理念下,中国已在努力分享抗疫信息、抗疫经验和抗疫物资,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合作,加强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沟通,加强同其他国家的专家和民众的交流。在对外交往中,应提升话语层次,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引导下对话语资源进行组织建构,形成超越语言和言语范畴的,具有思想内涵的系统性的“陈述群”,不但要宣传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交往中更要有行动支撑,做到“知行合一”。程曼丽认为,我们要防止落入“舆论陷阱”,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亟待从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并实现话语和行动的密切配合。

#### (五)病毒的传播学

通过观察和理解“病毒的传播”来反思传播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教授的研究重点,他分享了关于“病毒的传播学”的最新思考。他认为,新冠病毒为人类文明投下了阴影,如例外状态对民主、自由、保护隐私等价值观的威胁,病毒隐喻引发对中国的“他者化”以及“新东方主义”等,而从病毒的角度看待传播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应该恢复传播研究的物质性传统。刘海龙从“新传播研究”的视野提供了观察疫情传播的不同视角,研究者可以通过视角的不断切换拓展我们对“媒介”的理解。以病毒的传播为例,它与人际传播显著不同。首先,它是单向的,不考虑建立关系,只改造宿主,扩大自身数量。其次,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的媒介的视角,一是“以人为媒介”,二是“以病毒为媒介”。第三,其强调传播的物质性传统,理解病毒传播和信息传播的差异,寻找它们的共同点将加深对传播本身的理解。刘海龙强调,传播学应该关注作为传播的网络,比如,医院、交通枢纽、交通工具、电梯、门把手等都是病毒传播的节点,我们通过阻断与节点的连接来控制传染,关注节点产生的方式等也是传播问题,这与信息传播关注内容的倾向非常不同。因此,传播学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研究的主题、理论倾向和理解媒介的方式。

#### (六)不确定时代的“新生活政治”——文化研究的风险转向

文化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范式,暨南大学刘涛教授从不确定时代的“新生活政治”为切入点,阐释文化研究的风险转向。他表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位置”,其与历史上很多疫情不一样,它呈现出新的逻辑和生态景观。风险文化由此成为后新冠肺炎时代一种基础性的文化形式。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霸权主义、接合主义四种范式在疫情传播中都面临挑战,离开风险逻辑,我们无法解释当今的诸多文化现象。这表明,新冠肺炎时代的风险文化及其实践,超越了传统的理性主义框架,不确定性成为风险文化的基本表征和文化主因。相对于传统风险社会理论话语中的不确定性批判,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不确定性在生产、转化、场域和治理等方面呈现出新的逻辑体系和话语实践。首先,风险不再是被生产出来的,而是弥散在整个文化空间之中,并且体现为一种反结构、反存在、反俄狄浦斯的块茎逻辑。第二,风险不再可以通过一定的治理术和管理术在主体间转移,主体也不再能够借助流动的方式规避风险,因此风险转移或转嫁的阶级逻辑正在失效。第三,风险不再驻扎在既定的领域,而是穿透了场域之间的边界和界限,最终演化为跨领

域、再解域、多领域的复杂问题。第四,风险治理不再依赖制度主义,也超越了市场理性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理性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应对方案。进入后新冠肺炎时代,风险文化与不确定性的生产铺设了文化研究的底层逻辑,传统“生活政治”中政治逻辑的主导性遭遇风险话语的挑战和重构,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政治”正在悄然崛起,构成了真实的日常生活。于是,重思公私边界,重思生命、身体、共情意义上的协商可能,思考如何与不确定相处等问题将启发文化研究的下一步发展。

#### (七) 政治沟通视野下的政务微博传播

疫情伊始,各类谣言和伪健康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对社会舆论、民众的情绪和态度造成了较大影响。武汉大学的强月新教授在分析武汉市市政府官方微博“@武汉发布”在疫情期间的辟谣文本后发现:第一,辟谣时间差体现出失语与喧嚣;第二,辟谣主要回应对政府和官员的质疑;第三,辟谣主要是原创和转发的文本形式,“有图有真相”的方式较少,视频辟谣更少;第四,辟谣偏向采用主流官方信息作为信源;第五,约有70%的辟谣没有核查要素信息;第六,辟谣方式以直接批驳为主,间接核实探究、商议谈判的方式少;第七,辟谣时大多会带有一定的规训色彩。强月新从政治沟通的角度提出三个方面的思考:第一,强制性辟谣中政治沟通的单一向度对政治沟通效果造成一定风险;第二,封闭式辟谣中未将政务微博作为媒介,影响了辟谣的效果;第三,新冠肺炎涉及科学和医学的知识,辟谣主体更多地转向医生或专家,辟谣效果会更好。强月新指出,政务微博传播在政治沟通层面仍有欠缺,改进政务沟通至关重要,需要提高政治沟通的专业性、时效性和有效性。

#### (八)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伪健康信息以及纠正的思考

武汉大学吴世文副教授聚焦矫正伪健康信息传播的方式、特点和效果,探寻辟谣和更新民众观念的机制。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伪健康信息包括错误的病毒知识、错误的防治知识以及关于病毒起源的阴谋论等。警告、撤销和纠正是矫正伪健康信息的主要方式,但单纯的警告和撤回效果不佳。相对于伪政治信息,伪健康信息的矫正相对容易,但受到受众价值观的影响,相关工作仍然困难,全球性的矫正协作亦颇为无力。在疫情中,伪健康信息常先入为主,且平衡报道的原则也不利于矫正。但疫情让我们意识到,健康信息具有高公共性,对集体行动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科普教育、司法模式、特别工作组模式、专家工作组模式、社交网络平台模式之外,我们可以尝试吸引多元主体参与纠正工作,尤其是激发公民的积极性,降低伪信息的恶意传播,限制其影响。

### 三、讨论:理解人类社会疫情传播的多元可能性

基于以上议题的思考,参与云端对话的听众踊跃提问,学者们结合对问题的回答补充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西方国家在疫情初期排斥口罩的问题,王润泽指出,中西方对疫情传播的诸多认知存在差异,西方较认同口罩的功能是防止我传染人,在东方则是防止我被传染,这主要是卫生习惯方面的差异,不必赋予过多的价值判断,引发不必要的价值观冲突。孙玮进一步阐释了其对“流动”与“区隔”的看法,认为文化与技术的融合力量对“流动—区隔”的配置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因防疫需要而产生的健康码结合了大数据、人脸识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是“流动—区隔”配置的一种代表性模式。另外,就“作为媒介的人”而言,在网络时代,“流动”相对于“区隔”具有优先价值,正越来越构成人的本质。那么,应如何看待疫情期间中美“舆论攻防”呢?程曼丽认为这是大国博弈的一种外在表现,从源头上看,美国从2016年就开始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在美记者加强限制。我们无法选择是否进入“舆论战”,因为美国早已开始实施相关措施。刘海龙认为,破除研究中的任何一种中心主义都困难重重,中心主义可能是一种研究的需要,但我应对它们保持警醒和反思的态度,辩证地把握其边界。刘涛则补充说明了文化研究遭受批评的原因,指出当今文化研究的理论解释力不足,参与社会建构有限,对正义平等的关照存在简单化倾向。

武汉大学肖珺副教授总结指出,全球逾200个国家的人民已被笼罩在病毒的阴影中,对人类社会而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势必是场残酷而艰难的持久战。疫情蔓延之处,皆有传播之困。网络社会中的所有高度依赖媒介,通过移动传播不断追逐关于疫情的真相,寻求社会支持和安全感,与此同时,人们又在传播中批判传播,申斥假新闻、污名化、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仇恨等对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伤害与威胁。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是人类构建社会行动、心理认知和价值观的基础结构层。时时刻刻流动的信息通过选择性的扩散、采纳与排斥建立全球网络社会的权力关系,一直以来,竞争而非合作的全球化通过传播编织不平等的利益和价值网络。

令人不安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巨大的生态危机充满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的政客为了自身利益,持续散布充满恶意和谎言的种族主义话语和阴谋论,并试图通过这些歧视性内容煽动世界范围内对立的情绪和意识形态。传播作为一种权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塑造之中,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文化与行动轨迹。但是,不平等的交流制造了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全球传播中的霸权和剥削在此次疫情中显露无遗。可以预见,人类社会的疫情传播将必然是一种全球传播,它会更多地混合真相与情绪、事实与谎言、善举与恶行,他们将和病毒一起成为人类社会的自我挑战,甚至造成人群、社群、族群等多种关系间的撕裂。人类应该努力走出权力支配关系,从权力与反权力的动态博弈中探索全人类的团结之路。

由此,人类自身需要更多地省思病毒带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我们,作为传播的节点,都有义务通过持续而非碎片化的事实供给、真相讨论和跨文化对话生成反权力的传播空间,进而再重新审视我们,作为命运共同体看待世界和塑造社会交往关系的方式。疫情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灾难和痛苦,从某种角度说,正在发生的人类灾难也在推动“我与你”“我就是你”的主体间性公共空间的形成,或许,人类在关于病毒的生命叙事中,将有可能通过互惠性理解与沟通建构一种新型的全球社会。

## Communication Studies under Pandemic of COVID-19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Questions and Methods ——The Talks in the Air of the Forum on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in China(2020)

*Xiao Jun, Xiao Jingcao*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placed human society into a huge social crisis. The talks in the air of "Pandemic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Questions and Methods" proposed three cognitive paths, namely the history of life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interaction.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this dialogue also proposed eight topics for consideration: ① the plagu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news narratives of *Shen-Pao*; ② media dependenc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multi-subjects during the pandemic; ③ human as the media: mobility and iso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twork society; ④ the establish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COVID-19 outbreak; ⑤ virus communication; ⑥ "new life politics" in an uncertain era—a new shift to risk communic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⑦ government microblog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⑧ reflection on the false health information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its correction. Wherever the pandemic spreads, there is a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The ongoing human disaster is also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subjective public space of "me and you" and "I am you".

**Key Words:** COVID-19; pandemic; historical scenarios; questions and methods

■ 收稿日期: 2020-05-05

■ 作者单位: 肖珺,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20072

肖劲草,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责任编辑: 刘金波